

## 「同光魁傑」沈曾植在武昌幕中的詩文、 活動與內心世界

陳建銘\*

### 摘要

同光體詩為中國古典詩史的絢爛終章，名家輩出。此風之興，一方面繼承了道光、咸豐年間以來之時尚，也有晚清詩人對變風、變雅的需求。其中，沈曾植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來到湖廣總督張之洞武昌幕府，與陳衍、鄭孝胥的唱酬論詩，聲氣相求，一向被視為同光體——宋詩運動的關鍵時刻。本文嘗試指出，以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視野看來，武昌幕府是一個包含於權力場域中的文學場域，沈曾植因丁憂離京，迫於生計來此，期間的一舉一動，包括詩歌實踐，莫不與外來客的生存心態相關，為了累積文化資本，力爭上游，他意外成就了文學史上一段大事因緣。

沈曾植在詩歌上的移步換形，讓他勉強佔得一席之地。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事件爆發，沈氏終於找到政治實踐的契機。鷓鴣一枝，屈指三年，他由京師士大夫領袖、地方書院史學教席，搖身一變為江上說客，不只改寫了詩史，更進一步介入國史，乃至決定一己的晚年行止。

關鍵詞：同光體、沈曾植、陳衍、張之洞、幕府

---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熟悉晚清詩魁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號寐叟）《海日樓集》的讀者時不免有神龍無首之歎。近人錢仲聯（1908-2003）整理《沈曾植集校注》詩十二卷共一千兩百餘首，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公丁憂南歸」之前，<sup>1</sup> 僅收六十二題一百零四首。詩人那年四十九歲。曾植性懶，人所共知，其作「類不自收拾，散佚不知凡幾」。<sup>2</sup> 然而，《海日》集中早期作品不多，知命以後，他的詩藝及數量才迎來爆發期，其實牽涉戊戌（1898）、庚子（1900）間權力與文學的短兵相接。

戊戌年是清末政壇的關鍵時刻，從百日維新到政變，風雷四起。沈曾植曾襄助康有為（1858-1927）宣揚新政，巨變來臨前，由於丁憂，他遠離了政治風暴中心；又由於家貧，不能廬墓，遂出任湖廣總督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香濤）武昌幕下的兩湖書院史學分教（通稱「史席」）。這是文學史上一段大事因緣，論者一般認為，「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另一位宋詩派重要人物沈曾植進入張之洞幕府，標誌著幕府論詩進入高潮」；「沈曾植和陳衍同居一處，相與論詩，鄭孝胥也經常加入，『同光體』理論開始形成」。<sup>3</sup> 二三子風雲際會，中國古典詩史遂有了最後的「同光」。諸人之聚合，一方面接續道光、咸豐年間興起的宋詩運動風氣，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亂世詩人們共同心理，力倡變風變雅，有社會、思想淵源存焉。<sup>4</sup>

關於同光一派，由上述主觀（個人愛好、同人唱和）、客觀（道

<sup>1</sup> 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上冊，頁31。

<sup>2</sup> 陳三立，〈海日樓詩集跋〉，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18。

<sup>3</sup> 以上引文，見楊萌芽，〈幕府論詩：張之洞幕府與宋詩派文人群體的聚合〉，《古典詩歌的最後守望：清末民初宋詩派文人群體研究（1895-1921）》（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年），頁64、66。

<sup>4</sup> 參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卷4，頁533；涂小馬，〈「同光體」研究綜述〉，《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1期（1998年2月），頁55-59、63。

咸以來詩壇風尚)兩面說來,皆言之成理。但本文認為至少還應考慮一個特殊場域裡的權力博弈。借鑑法國思想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的視野,武昌幕府是一個包含於權力場域中的文學場域,<sup>5</sup> 權力門窄,文人有術,誰不力爭上游?《文心雕龍·總術》曰:「文場筆苑,有術有門。」<sup>6</sup> 身為一名行動者、幕府的「新進場者」,沈曾植鷦鷯一枝,棲羈三年,漸漸轉化個人及其詩歌面目,產生新的「慣習」(或譯「生存心態」),此際他的詩歌實踐可視為布氏理論中「文化資本」的積累,具體行為包括詩歌的創作與流通,公私聚會場合的唱酬等。<sup>7</sup> 若其實踐獲得認可,即轉化為「象徵資本」,有望進一步兌換為他念茲在茲的「經濟資本」:由府主掌控的職位與俸祿分配。當沈曾植於武昌總督府門內佔得一席之地,中國古典詩史亦因而迎來了「同光」的落日餘暉,更有甚者,他乃就此脫離名流、詩人、學問家身份,看見事功之可能,進一步影響了大歷史走向以至小我的晚年行止。一切要由這名守制人如何成為入幕賓說起。

<sup>5</sup> 場域(field)由不同的位置構成,這些位置相互依存,並影響行動者(agent)之行為。行動者在其中的一言一行,觸受愛取,皆受慣習(habitus)和資本(capital)之影響。慣習,指個人成長過程與社會環境的互動所形成的行為傾向,人們自然地依此應對當下情境,恍若不識不知。而資本——包括經濟資本(economic capital)、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等各種形式;「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則是上述三種形式資本的被認可——決定了行動者的位置及影響力,善加累積,可以力爭上游,成功佔位(position-taking);反之若資本闕如,慣習亦自覺或不自覺地發生變化。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影響了行動者於場域中的行動和決策。詳參〔法〕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美〕華康德(Loïc Wacquant)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頁131-186。布氏於中文世界譯名參差不一,本文統一作布赫迪厄。

<sup>6</sup> 〔南朝梁〕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卷9,頁657。

<sup>7</sup> 布赫迪厄將「文化資本」分為三類,(一)具體(embodied)的文化資本;(二)客觀化(objectified)的文化資本;(三)體制化(institutionalized)的文化資本。見包亞明譯,《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193-201。放在古代文人的語境中來看,具體的文化資本包括知識教養、談吐、趣味等,沈曾植於武昌幕中的書寫風格訓練,詩歌創作,即席唱酬與應對屬之;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包括書籍文物的收藏;體制化的文化資本則如科舉功名。

## 二、抱冰幕下的佔位遊戲

布赫迪厄總是思考將一個人導向一目標的力量為何，在他的想像裡，那並非客觀，亦不主觀。場域由大小不一的位置構築起來，行動者被各種慣習牽引，即便缺乏自覺的算計，也能依照經驗行事，百不一失。他們的最終目標即是獲取利益、占據位置，如此一切，端靠各項資本之纂積，彈丸纍到十枚時，方可兌現。明乎此，可談幕府中一眾主客看似隱微的行動與互動。

晚清豔稱曾國藩（1811-1872）、李鴻章（1823-1901）、張之洞、袁世凱（1859-1916）「四大幕府」，張氏抱冰堂居其一。不同於諸大僚追求軍功，抱冰幕下文章學術傾向最為濃厚，前後來附者有張裕釗（1823-1894）、譚獻（1832-1901）、樊增祥（1846-1931）、陳三立（1853-1937）、陳衍（1856-1937）、易順鼎（1858-1920）、梁鼎芬（1859-1919）、鄭孝胥（1860-1938，號蘇堪）等，光宣詩壇健者星聚於此。張幕的核心，主要來自其外放考官時主試、任學政時視學的座主、門生關係，同時張氏也勤於招攬地方學者，吸納離京的朝中名士，成分頗為多元複雜；<sup>8</sup> 學者名士，多半收蓄於文教機構：

張之洞自兩廣總督移節兩湖，朝士趨赴者，分為數類，之洞乃以廣大風雅之度，盡量招納，以書院學堂為收容之根據，以詩文講學為名流之冠冕。其時……又有告假出京之朝士在兩湖，如周樹模、周錫恩、屠寄、楊銳、鄭孝胥、黃紹箕、沈曾植、曹元弼、楊承禧等。此外如文廷式、張季直之流，皆驛通朝政，引為聲援，則為廣通聲氣之朝士矣。<sup>9</sup>

<sup>8</sup> 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6-17。

<sup>9</sup> 劉成禺撰，錢實甫點校，《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81。

從兩廣、兩江到兩湖，張之洞遍歷封疆，門招天下客。上述學人幕僚不必精通刑名錢穀，甚至不必實際上堂講學，可說十分優容。身為動見觀瞻的都下名士，沈曾植離京前一年秋冬間，張之洞轄下兩湖書院、陳寶箴（1831-1900，字右銘）轄下校經書院先後來電徵招，曾植選擇前者，心中頗以為榮。不過，這次聘任一波三折，張之洞姪兒張彬（?-？，光緒十五年〔1889〕舉人）有一封家書談及內幕：

昨叔嶠來言，前接梁星翁電，詢子培何日赴湘。詳此電語氣，子培鄂館，自系尚未定局。子培學問、筆下均好，在鄂幕甚屬相宜。雖與常熟系親戚，然與吾家既系世交，長者待渠家昆仲，可謂至厚。此次到鄂，相處必能融洽。將來回京，必不至向常熟處播弄是非。矧前接鄂中定館電後，湘即有電來延，束修千金，伊登時辭卻。京中諸友詢及館地，皆告以已與鄂中定局。伊頗以在鄂幕中為榮，故決辭湘館。鄂館定局已遍告于同人，此時若再變計，無館尚屬細故，見拒于清流，伊實難以為情，必為都人所笑，伊當深銜鄂中矣。此電尚未送伊閱云云。屬侄代陳于慈座，並懇仍將館局定議（此處似有缺頁）。<sup>10</sup>

星翁即梁鼎芬，字星海，號節庵，曾植庚辰（1880）同年進士，兩人頗有往還。光緒十一年（1885），梁以彈劾李鴻章「六可殺」被摒出都，京師名士領袖盛昱（1850-1900）邀集曾植等同人卅人為其餞行，轟動一時。兩年後，梁鼎芬受張之洞延攬主持肇慶端溪書院，後移主廣雅。光緒十六年（1890）興辦兩湖書院，仍以鼎芬為院長。此處「詢子培何日赴湘」云云，蓋欲驅曾植往湖南，有心拒客，抱冰門人楊銳（1857-1898，字叔嶠）託張彬向大人說項，期盼有所轉圜。按沈曾植出「常熟相國」翁同龢（1830-1904）門下，常熟、南皮勢如水火，翁

<sup>10</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藏「張之洞檔案」。原文及作者、部分內容考釋，見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頁118-124。

氏對張「一意傾陷，僅免於死」，<sup>11</sup> 晚清政壇眾所周知。梁鼎芬由翁門轉投張門十餘年，早被視作腹心，曾植猶是師門親信，翁同龢印可的「此人思慮深，不免過慮，然待我之意殷殷」，<sup>12</sup> 引入武昌，會否「向常熟處播弄是非」？梁氏藉口，從中作梗，驅逐競爭者也是佔位遊戲的一種常見型態。

沈曾植決定接受了兩湖聘任，話已出口，變卦傷人。在京中的張門弟子楊銳立場不同，他認為不應結仇名士，張彬也力贊其成，謂「長者待渠家昆仲，可謂至厚」，不必擔心將來口舌——君子不談是非，可以期待，但「至厚」云云，也是虛言。翻閱《沈曾植年譜長編》，戊戌年結為賓主以前，張之洞身影不多見，偶一出沒，為梟為鴟。如光緒十二年（1886），李慈銘（1830-1895）記曰：「沈子培言，前一日晤之（按：馮芳緝），極言張之洞專橫偏謬誤國之罪，言之憤憤，神采甚王。」<sup>13</sup> 可覘見同人議論之一斑。至於「長者待渠家昆仲」究竟如何，李慈銘另記下了一筆考御史的恩怨：

子培親老身弱，勤學耆古，今以刑部貴州司主稿兼在總理各國衙門行走，疲於吏事，故冀入臺，以謀息肩。此次試卷甚得意，以為必首列矣。乃為南皮所黜，蓋文義博奧，多不經見之字，又比它人多書一葉，故南皮深惡之。以卷中一處漬水迹如黍點，遂夾一籤，云卷有污。蓋近來直隸三相國專守道光間歛縣衣鉢，

<sup>11</sup> 「廣雅相國敷歷內外數十年，舍高陽李相國鴻藻外，孤立無助，而最有憾於翁叔平相國同龢。……己酉自定詩集，於〈送同年翁仲淵殿撰從尊甫藥房先生出塞〉詩，自注詩後云：『……後來叔平相國一意傾陷，僅免於死，不亞奇章之於贊皇。此等孽緣，不可解也。』」陳衍撰，張寅彭、戴建國校點，《石遺室詩話》，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冊1，卷11，頁155。張詩及自注見〔清〕張之洞著，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上冊，卷2，頁31。

<sup>12</sup> 〔清〕翁同龢著，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冊6，頁2976。

<sup>13</sup> 〔清〕李慈銘，《越縕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冊15，頁11005。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力斥博辯宏偉之文，視學如仇，每主文試，以輓回風氣自命，  
原伯魯之子遍於天下矣。<sup>14</sup>

沈氏自登科後以進士籤分刑部主事共十餘年，沉淪冗曹，疲於吏事。光緒十九年（1893）以六部郎中考選監察御史，二十三人中應取十四名，曾植有心轉任言官，場中得意，自以為奪魁有望；卻因為文義過於古奧，不符合主考張之洞脾性，借細故（「卷中一處漬水迹」）黜為第二十名。「視學如仇」，越縵老人氣極妙語。這是一次典型的「正統」（orthodox）與「異端」（heterodox）之爭。「直隸三相國」及張之洞象徵支配階級，透過主試（一次「再生產」〔reproduction〕），鞏固此派人醇正之文字品味。對他們而言，文章關乎世運，沈卷支離深僻，不免斫傷元氣，於是強加黜落，「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印記歷歷，果然「場」中莫論文。

張之洞的武昌幕府是另一個由他絕對支配、具體而微的場域。雖說具體而微，此間人才濟濟，甚至能排座次、分流品。劉成禺（1876-1953）為兩湖書院子弟，據其記載，南皮在鄂人才有「九品宗正」：第一名流居宴會首座（「分缺先」），第二名流宴會列三四座以下（「坐補實缺」），第一二名流之間尚有賓僚（「分缺間」），餘子則「未入流」。京官在籍者，張氏也多加延攬，禮遇有加，時諺呼為「京流子」。<sup>15</sup> 沈

<sup>14</sup> 〔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冊18，頁13404。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以上兩條材料先見於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筆者按圖索驥，加以覆按，不敢掠美，特此說明。

<sup>15</sup> 「南皮廣延名流，禮遇有差。往來鄂渚不入幕者，當時目為第一名流。如王闓運文廷式之屬，經心、江漢山長譚獻、張裕釗、吳兆泰之屬，宴會首座，時諺呼為『分缺先』。幕府諸賢，如汪鳳瀛、王秉恩、錢恂、許珏、梁敦彥、鄭孝胥、程頌萬之屬，兩湖、經心監督、分校余肇康、姚晉圻、楊守敬、楊銳、屠寄、楊裕芬、鄧鐸、華蘅芳、紀鉅維之屬，宴會皆列三四座以下，當時皆目為第二名流，時諺呼為『坐補實缺』，總督僚屬分司也。而梁鼎芬、蒯光典、陳三立、易順鼎，位在第一二名流之間，名曰賓僚，時諺呼為『分缺間』，他如陳慶年、陳衍、張世準之屬，不過領官書局月費，時諺呼為『未入流』。京官在籍如周樹模、周錫恩之屬，禮遇有加，時諺呼為『京流子』，此南皮在鄂人才之九品宗正也。」見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註》（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卷1，頁92-93。標點符號經筆者修改。

曾植任兩湖書院史學分教，宴會列三四座以下，原屬第二名流，但以北來京官身份較值錢耳；惟地位又不如原籍湖北、擁有本地人脈的「京流子」（沈氏祖籍浙江嘉興）。座次流品，暗示著上下流動的可能。常熟門人，帶一身恩仇前來投奔，沈曾植初入張之洞幕府，不諳場中遊戲規則，總顯得不合時宜。慢慢他會知道，力爭上游，要在詩文一道。那是最為關鍵的文化資本。

在布赫迪厄的架構裡，文化生產場域存在於一般權力場域（general field of power）之內，有其內部運作規律，政治和經濟（「他律原則」）並不能直接對其產生影響（還需與生產者的「自律原則」鬥爭）；<sup>16</sup> 反過來說，文化資本要兌現為經濟與權力亦難，既不直接（存在耗損率與隱蔽率），也不即時。<sup>17</sup>

然而，張之洞的武昌幕府恐怕會讓布老咋舌。在這裡，府主的認可既是審美授權，也是政治保障，標誌著象徵資本在微型場域中以集權形式高度濃縮與快速運作的可能。張氏曾評價部屬蒯光典（1857-1910）「是學問人，不是作事人」；周錫恩（1852-1900）「氣宇文章的是能幹事人，作經濟一家，實是可成」云云，<sup>18</sup> 似乎頗能精準定位人才。但是當決定僚屬浮沉時，又往往見「詩」心喜。「張文襄每與客集，必打詩鐘，佳者擊節歎賞。蔡伯浩以得明保，黃叔頌因委宜昌釐金缺」，<sup>19</sup> 蔡伯浩（1861-1916），名乃煌；黃叔頌（1855-1914），名紹第，當時傳聞，二人詩鐘出色，博得主人歡心，乃授富庶的蘇松太道

<sup>16</sup> 〔法〕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作，石武耕、李沅沅、陳聆芝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臺北：典藏藝術家庭公司，2016年），頁338-339。

<sup>17</sup> 「經濟資本可以更容易、更有效率地被轉換成象徵資本（包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反之則不然，雖然象徵資本最終可以轉換成經濟資本，但這種轉換卻不是即時性的。」參見宮留記，《資本：社會實踐工具——布爾迪厄的資本理論》（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24。

<sup>18</sup> 以上引文，見〔清〕周錫恩著，陳春生點校，〈記粵東謁孝達師〉，《周錫恩集》（武漢：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22年），頁105。

<sup>19</sup> 李詳著，李稚甫點校，《藥裏備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90。

(上海道)、宜昌川鹽局總辦等優缺。這類職務主管關稅、釐金之徵，由於抽稅額不易確定，官員或加徵多收，或額外浮收，或多收少報，中飽私囊，種種舞弊不一而足。以詩鐘得官之事儘管言人人殊，然而膾炙人口，可見一時物議。<sup>20</sup> 無論如何，要想於鄂中立足，詩文乃第一要務，如鄭孝胥記其初謁張之洞之情景：「香濤制軍問余：『於文，誰師？』對曰：『喜子厚之無障翳。』制軍笑曰：『閩人固多好子厚也……。』」一番往覆考核後，才有了數日後的「迅速來轅辦理洋務文案」。<sup>21</sup>

總督帳下，求見者眾，當然也不乏弄巧成拙之人：

陳銳，……久無差缺，……陳思與之洞一談，必折服之，為最上策。之洞詩與駢文，是其所長，不如專談古文，或攻其所短。計定入見；之洞問曰：汝善何種文學？曰：古文。又問：古文習何文？曰：八大家。又問：八大家喜讀何家？曰：韓昌黎。又問：韓文最喜讀何篇？曰：原道。之洞連聲曰：原道、原道；語未終，舉茶送客，陳銳從此無見總督之望矣。<sup>22</sup>

上文謂「詩與駢文，是其所長」，按張氏學問，門庭廣大，但自述一生用功最深，「仍是詩耳」，<sup>23</sup> 尤其雅嗜北宋。才人與其攻其所短，不

<sup>20</sup> 按蔡乃煌(1861-1916)以「射虎斬蛟三害去，房謀杜斷兩心同」得張之洞青睞補上海道一事，屢見晚清民國筆記如李詳(1858-1913)《藥裏備談》、易宗夔(1874-1925)《新世說》、趙炳麟(1877-1927)《柏岩感舊詩話》等。江庸(1878-1960)1934年之《趨庭隨筆》首揭該聯乃張氏親作。然而，此說流傳不已，時人甚至有謂「本為粵人蔡伯浩乃煌所作，外間均傳張之洞手筆。蔡與人言，亦堅承為張作，非己作，真善事大官者矣」。可知當世之人也霧裡看花，將信將疑，而南皮用人的一時物議可思過半矣。參劉成禺撰，錢實甫點校，《世載堂雜憶》，頁138。

<sup>21</sup> 以上引文，見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冊1，頁446、448。

<sup>22</sup> 劉成禺撰，錢實甫點校，《世載堂雜憶》，頁60-61。

<sup>23</sup> 「樊樊山嘗從容侍坐，問老師之學，包羅萬象，然平生以為用功最深者究何事？公默然久之，曰：『仍是詩耳。』」見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讀廣雅堂詩隨筆》，《蒼虬閣詩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頁331。

如投其所好，即使彼此風格不合，改換腔調可也。前述梁鼎芬鑄級而歸，讀書鎮江焦山海西菴，有心依傍南皮門庭，便在王仁堪（1848-1893，字可莊）提點下，易其晚唐面目，以求升堂入室：

可莊告節庵曰：「……張自命名臣，實則飽含書生氣味，尤重詩文。其為詩也，宗蘇、黃，而不喜人言其師山谷；又喜為紗帽語。君詩宗晚唐，與彼體不合，非易面目，不能為南張升堂客也。涉江采芙蓉，君自為之，僕能相助，否則，老死江心孤島耳。節庵深然其說，遂為之洞入幕之賓，可莊教之也。<sup>24</sup>

因知陳衍《石遺室詩話》曰「（按：節庵）避地讀書焦山海西菴，乃肆力為詩，時窺中、晚唐及南、北宋諸名家堂奧」，<sup>25</sup> 由他原先宗尚的晚唐陡然而下，元祐一關，如此打通也。「侏儒欲死君弗治，清談可飽吾不飢……」，梁鼎芬的〈謝王二太守（按：即仁堪）兄送米詩〉不妨視為一種風格練習，何嘗再為「詩愛冬郎盡日看」<sup>26</sup> 的香奩體？

王仁堪這番話說得痛快，近乎市儈，然而，在布氏的理論中，詩文的體裁、流派、風格、形式、手法、主題，本就不僅只是純美學追尋，風格改易，不必關乎創作者個人審美，端看其於兌換價值：

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為生產者而生產的這個區塊裡，而且可能在此範圍外亦然，針對某個選擇的全然風格性或主題性的志趣，以及屬於純美學追尋的……即便是在作出這些選擇的人眼中，也都掩蓋了（至少到了最後還是會）與他們相關的物質與象徵利益，而這些獲利只有在援用犬儒算計的邏輯時，才會破

<sup>24</sup> 劉成禺撰，錢實甫點校，《世載堂雜憶》，頁 82。

<sup>25</sup> 陳衍撰，張寅彭、戴建國校點，《石遺室詩話》，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冊 1，卷 1，頁 26。

<sup>26</sup> 以上引文，分見梁鼎芬，〈謝王二太守兄送米詩〉，《節庵先生遺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18；〈讀韓致堯詩感題二律〉，頁 77。

例露出它們的真實面目。

.....

無論是在當下，還是在每一種藝術（等等）生涯的轉捩點，一方面，在這個（按：文學場域）空間裡提供了哪些可能性——也就是不同的體裁、流派、風格、形式、手法、主題等等——而人們在考慮這些可能性時所依據的，除了這個空間的內部邏輯之外，還有每一種可能性在相應空間的所處立場為其帶來的社會價值；<sup>27</sup>

迎合支配者的品味，投其所愛，才能「佔位」，成為「升堂客」。易順鼎曾經抱怨張之洞對於鄭孝胥詩的「溺愛不明」。<sup>28</sup>「愛」之一字，其實大有可談。按京官、幕客，性質大不相同，前者可以累積閱閱，於文官制度中慢慢升遷，後者更具私人色彩，主人逐客，一切皆休，毫無任何保障可言，等同時時在懸崖邊。賓主遇合講究氣味相投，退隱淵，愛加膝，講究一見鍾情。

京師往事不足論，張之洞、沈曾植在武昌首度以主客身份相見，可稱做這段關係裡的初見。書院史席，照例一年一聘，沈曾植因生計窘迫入鄂，自稱「不能一日〈不能〉無館之人」，<sup>29</sup>欲使主人愛而留之，第一印象至關要緊。

<sup>27</sup> 〔法〕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作，石武耕、李沅沅、陳羚芝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頁 366-367。

<sup>28</sup> 陳聲暨、王真編，《石遺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卷 6，頁 251。

<sup>29</sup> 沈曾植，〈與丁立鈞〉（其十五），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21 年），頁 30。此札「不能」重複兩次，造成語意錯亂，更見書寫者的焦心。

### 三、戊戌年（1898）：格格不入的新來者

沈曾植於戊戌閏三月登楚材輪來謁張之洞，五月至兩湖書院。江南卑濕，北人畏熱，他帶著一身憂病而來：

弟節後至此，寓紡紗局中。已屆四旬，無日不病，無病不出於意外。推原其故，深疑此間風土於賤體不甚相宜。

鄙在此患熱癰，此兩日太陽旁一顆最大最痛，……本地人云尚有秋老虎，怕極怕極。

……制軍月送百金，筆墨、編書皆如原約。間三五日，輒以車馬來迎乘涼夜談，王雪岑、梁星海均大以為苦，鄙卻不覺，惟議論往往不合，亦無如我何。<sup>30</sup>

到職方閱月，賓主連番夜談，沈曾植說大人則藐之，氣吞制軍帳下諸賢，語帶滿滿自信。張之洞非一般府主，此老博學，擅以權術馭人，「或有薦幕友者，無不并蓄兼收，暇時則叩其所學，傾筐猶不能對其十一，多有知難而退者」。<sup>31</sup> 沈氏一世京官，名士積習未改，初入蓮幕，就與主人「議論往往不合」，並以「亦無如我何」沾沾自喜，姿態近乎狂生徐渭（1521-1593）：「是時公（按：胡宗憲〔1512-1565〕）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sup>32</sup> 讀書人理想中的幕客形象。或許因為如此，主客二人並未一拍即合。上引沈氏家書作於客舟飄搖之中，他的身心也不安

<sup>30</sup> 以上引文，分見沈曾植，〈與丁立鈞〉（其十三），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29；〈與李逸靜〉（其三），頁94。

<sup>31</sup> 〔清〕李伯元，《南亭筆記》（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卷16，頁1。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sup>32</sup>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徐文長傳〉，《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中冊，頁715。

穩。張彬京中密信所謂「伊頗以在鄂幕中為榮，故決辭湘館」，並不完全屬實，武昌才剛安頓下來，此際又赴湖南一轉，別營免窟（用曾植自己的話說，更顯窘迫而貼切：「沿江托鉢」）<sup>33</sup>：

廿三晚抵長沙，船中甚熱，有一夜竟不能安睡。到後體中頗憊，  
廿五出門兩次。與陳又翁、徐顏甫均久談，當時覺氣竭，歸後  
即脫肛，記去年似有過一回，然不如此之甚。<sup>34</sup>

陳又翁，沈曾植的另一名潛在幕主，湖南巡撫陳寶箴。戊戌七月，陳寶箴提調沈曾植為長沙校經書院主講，束脩四百金，不無小補（「僕此館以今歲為期，束脩四百金，省嗇用之，尚可稍留明年地步」）。<sup>35</sup>徐顏甫即徐仁鑄（1863-1900，字研甫），時任本省學政，辦新政，興實學，陳之一臂。曾植赴湘，原擬受聘為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主事者「已允長年千金」，後來又遭故人易順鼎從中作梗，<sup>36</sup>只充任書院短期主講，大約條件不佳，有意觀望（「書院山長住處甚小，不能住眷，到彼恐須用一燒飯人，地氣潮濕，亦不願移眷，武昌自較勝此，歸時面商可耳」）。<sup>37</sup>無論如何，陳、徐二人為當然上司，這另一次的「入場」，沈曾植病中撐一口氣作兩次長談，並非尋常對友舉盞而已，最後穀道失守，元神洩盡，客中身不由己可知。

又一月，深宮政變大作，同人驚恐。義寧父子隨後斷送仕途，陳寶箴永不敘用、陳三立一併革職；徐仁鑄之父徐致靖（1844-1917）鉤康黨，列名戊戌第七君子；張之洞正急急上奏，願以全家百口保愛徒楊銳，沈曾植藉口祥祭期近辭館返武昌，恐不無大樹底下避暑意。

<sup>33</sup> 沈曾植，〈與李逸靜〉（其四），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96。

<sup>34</sup> 沈曾植，〈與李逸靜〉（其五），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96-97。

<sup>35</sup> 沈曾植，〈與李逸靜〉（其二十三），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111。

<sup>36</sup> 曾植不受湘職，或在條件不夠優渥。原來，劉坤一（1830-1902）「已允長年千金」，經易順鼎多次阻撓，負責出資的湖南督銷局只願撥四百金。始末見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206。

<sup>37</sup> 沈曾植，〈與李逸靜〉（其五），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97。

輪船一去一還，江湖多風波。舟中人因病況纏綿，羈留揚州（「瘡傷不寐，繼而咯血，繼而痔漏腸紅」）。十一月回鄂，下榻湖廣總督府邸，是他接近幕主的最好時機。無奈此番相見，依舊話不投機，沈曾植私下致友一信，頗為喪氣：「抱冰談興似減往時，無米之炊，此固最足耗人意氣者。」<sup>38</sup> 好在下一年春天，曾植返家歸葬雙親畢，武昌又捎來新的聘書：

今年擬請閣下為兩湖書院史學分教，功課疏密以及如何訓課之法，均由台端酌定，無須上堂講授，如有事赴滬，亦可隨意往來。至脩金仍照去年台駕在鄂之數，除分教向章八百金外，另送譯書脩金四五百金，如有編纂之書，計書另送。務懇數日內迅賜命駕來鄂，專候開學，切盼示覆。元。<sup>39</sup>

按兩湖書院經學、史學、輿地、算學四門分教，曾植主持其一；脩金條件依舊（歲入一千二百兩），課程安排自主性極高，貌似優容。但我們知道，張之洞轄下書院取消宋元以來傳統的書院山長制，改設監督，此後政學不再分庭抗禮；師盡為官，清末名流言之痛心：「中國千年山長制度，竟喪於張之洞之手，中國此後無師矣。」<sup>40</sup> 優容，其實即是收羅豢養，此亦南皮幕下「賓」消「僚」長之一端。<sup>41</sup> 曾植續命，仰人鼻息，作為府主，張之洞還寬容地提及了「如有事赴滬，亦可隨意往來」，這樣的自由反面來看，即非心腹。檢家書可知，沈曾植此時曾向上海道盛宣懷（1844-1916）處投石問路，無奈事有未果，「祇好去看楚中江山矣」。<sup>42</sup>

<sup>38</sup> 以上引文，分見沈曾植，〈與王彥威〉，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343；〈與黃紹箕〉（其三），頁47。

<sup>39</sup> 〔清〕張之洞，〈致嘉興沈子培部郎曾植〉，趙德馨主編，吳劍杰、馮天瑜副主編，吳劍杰、薛國中點校，《張之洞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年），冊9，頁390。

<sup>40</sup> 劉成禺撰，錢實甫點校，《世載堂雜憶》，頁48。

<sup>41</sup> 詳見尚小明，《學人遊幕與清代學術（增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18年）。

<sup>42</sup> 「回揚之期約在月底月初，滬館大約不能就。香老有電來催，已覆以四月望邊到鄂。看來此

湘館、滬館都已絕念，沈曾植迎來在武昌落腳的 1899 年。丁憂出京，沈氏曾意識到自己理論上「制中不為韻語」，<sup>43</sup> 至此年而大作特作，走入詩藝的爆發期，一半是機遇，一半是不得已。

#### 四、己亥年（1899）的應酬、唱和：「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的累積

開宗明義，本節所謂「文化資本」之積累，在於作詩、論詩、贈詩、獻詩，在獻給張之洞的詩中，沈氏小心調整著自己的姿態，展現其賓客對幕主的順隨，不再高蹈；而更重要的是其詩學風格之斟酌：閱讀梅堯臣（1002-1060）、王令（1032-1059）並大量創作，意圖扭轉負面評價，趨近府主品味。何以能移步換形？那是他來鄂所獲的重要「社會資本」<sup>44</sup> 正在運作並發生效用，這一年，沈曾植與陳衍、鄭孝胥等交往頻密，唱和論詩，共同鼓吹「三元說」，雖是一時風雲際會，卻也各藏心思。且看下文分曉。

楚中山川看了又看，詩人總還把握不好。己亥九月，沈曾植偕弟赴揚州省兄，後渡江返武昌，賦有〈小孤山〉一首，意態頗為奇特：

潯陽九派淪無跡，介石猶然立江磧。峨峨高髻古嚴妝，俗眼還疑肖形拙。大孤眇然湖中央，小姑無端對澎湃。楚巫襍鬼瀆男女，楚兒吟弄傳荒唐。鄴亭之神風不颺，江湖小龍閱威祥。鐵輪世界一回適，叢靈社鬼吁其亡。匡廬南望山蒼蒼，大湖雷轟

---

地（按：上海）與吾輩無緣，祇好看楚中江山矣。」沈曾植，〈與李逸靜〉（其七），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 99。

<sup>43</sup> 錢仲聯〈野哭〉注引沈曾植《戊戌旅湘日記》八月二十二日記：「制中不為韻語，情不能已，溢而為詞」。沈曾植，〈野哭〉，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 195。

<sup>44</sup> 社會資本是行動者在社會關係中的投資，社會關係的投資者可以使用和借用團體中其他行動者的資本。見宮留記，《資本：社會實踐工具——布爾迪厄的資本理論》，頁 147。如沈曾植、陳衍、鄭孝胥的往來唱和、他們從彼此身上獲得的詩學提示、聲望與同盟情誼，詳後。

非余詳。經師問話有違異，估客指向增睚眦。老胡碧瞳眖璣尺，  
室有圖書諳地防。嗟余四食武昌魚，瞠目山川麓未識。山神識  
我故相迎，峰不知名分外青。風雨重陽占未改，登高且上柵樓  
行。<sup>45</sup>

小孤山為江面上突兀一石，高三十丈，晴髻離離；澎浪磯隔江遙遙相望，歷代詞客常藉「小姑」、「彭郎」諧音抒發浪漫情懷（如東坡接近輕佻的名句：「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sup>46</sup> 這裡又是兵家必爭要地，憂國者也可以聯想戰事，南宋末年謝枋得（1226-1289）「天地偶然留砥柱，江山有此障狂瀾」，<sup>47</sup> 兼以自寓；「今典」如太平天國一役，湘軍水師名將彭玉麟（1817-1890）攻拔此地，快意賦詩「十萬貔貅齊奏凱，彭郎奪得小姑回」，<sup>48</sup> 四十年前事而已。

沈詩寫得毫不像歷來的小孤題詠。古書記載的潯陽九脈支流，今已無跡，傳說中高髻峨峨的山形，詩人「俗眼」總看不出相似處。小姑無端遙望彭郎，徒惹楚人多少風月閒談。「鐵輪」，錢仲聯注引佛典之轉輪聖王四寶之一，初無負面義，沈詩多用雙關。鐵輪蓋亦是渡江輪——艤衝巨鑑「回譎」（曲折）航行，江上鬼神遂退隱。

小孤山種種既渺茫難知，沿江有匡廬、太湖、雷轟，名山大澤的來歷與方位又「非余詳」，外在風景殆不可把握。下面「老胡碧瞳」是破譯此詩的關鍵，錢注引「西方老胡，厥名文康」等，<sup>49</sup> 語焉未詳。學者或指為張之洞，「他雖然身居高位，但仍然雅愛圖書，探索學

<sup>45</sup> 沈曾植，〈小孤山〉，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229-232。

<sup>46</sup> 李時人主編，《古今山水名勝詩詞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833。

<sup>47</sup> 李時人主編，《古今山水名勝詩詞辭典》，頁833。

<sup>48</sup> 〔清〕彭玉麟著，梁紹輝等整理，〈攻克彭澤奪回小姑山要隘〉，《彭玉麟集》（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頁38。

<sup>49</sup> 沈曾植，〈小孤山〉，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231。

問」，<sup>50</sup> 不確。或謂指洋人船長，<sup>51</sup> 較可信。按清末 1890 年代，長江航運由招商局及怡和、太古兩洋行三分天下，<sup>52</sup> 沈氏搭赴揚州的吉和輪即屬英商怡和。即使在中國招商局轄下，高級船員也全借重西人。<sup>53</sup> 但由該說引申出「帝國主義侵略」的側影，八國聯軍，洋人熟悉中國地理環境而「諳地防」，沈曾植「四食武昌魚」，正當密商保護長江之策，瞠目山河，有深沉的時代的感慨，不免時空紊亂——東南互保實為明年（1900）庚子事。

此詩奇特，無關上述任何時人、時事。作為晚清「多聞第一」的學人，沈曾植與外在世界不融合地對峙時，往往先回歸知識的掌握。<sup>54</sup> 然而，關於楚中山川，不管透過書本（經師問詁）、經驗（估者用手去指），最後都只帶來混亂、模糊，治絲益棼。惟有西洋知識可以精確定位一切，但那專屬於擁有地圖、西文書籍，工具與標尺的外籍船員。詩人掌握不住四訪後仍屬陌生的風景，「瞠目山川獲未識」（我們想起杜甫：「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世界的破壞），<sup>55</sup> 最後，他甚至掌握不了一首詩——在沒有打擾者的情況下，風雨重陽，口占未改。<sup>56</sup>

<sup>50</sup> 嚴明編著，《沈曾植》（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年），頁 45。

<sup>51</sup> 毛慶耆主編，《近代詩歌鑒賞辭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562。

<sup>52</sup> 參見林志龍，〈1903-1905 年英日航業長江航運競爭——以日本郵船收購麥邊洋行事件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26 期（2006 年 11 月），頁 109-128。

<sup>53</sup> 曲金良主編，《中國海洋文化史長編：典藏版》（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17 年），頁 2026。

<sup>54</sup> 明清嘉興沈氏，素稱望族大姓。曾植一家三代京官，都下生活前後恰為一甲子。歸里後，仍如寄客，他乃有〈八月廿四日，補作逸社第六集於敝齋。吳俗於是日為稻稟生日，《禾志》載俗諺曰「上午雨則竈上荒」，言米貴；「下午雨則竈下荒」，言柴貴也。是日快晴，廡黔墨突，因拈此題，以諗諸公各以鄉俗賦秋成詞〉（篇名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之作，透過《嘉興府志》、《齊民要術》、方言、諺語、俗字等故園花木知識，試圖釋放心神，重新親近「吾禾」。見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下冊，頁 947。

<sup>55</sup> 詳參莫礪鋒，〈一組同題共作的登塔詩〉，《莫礪鋒講杜甫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年），頁 152。

<sup>56</sup> 參錢注可知，此處引用的典故為「滿城風雨近重陽」殘句。「昨日溝臥，聞攪林風雨聲，欣然起題其壁曰：『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租人至，遂敗意」參〔宋〕釋惠洪，《冷齋夜話》

「四食武昌魚」還值得一談。幕下士，可食魚，張之洞鄂中養士，無愧孟嘗（？-279 B.C.）。惟此句錢仲聯注僅引《三國志·吳書·陸凱傳》童謠一句「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並說明曾植四入武昌的因緣，未引的下半赫然曰：「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sup>57</sup> 那是吳人不願遷離故都的賭咒。子在江上，魚在釜中，武昌在典故深處是一個令人不安的環境。

重陽的習俗是登高，驅除瘟魔。看著風雨中無法佔據的小孤山，老人只孤獨地爬上了輪船的高處。

揚州歸來，秋老虎與瘟魔都沒出現，反而招致瘧鬼。南皮制軍帳下，安用病客？沈曾植病瘧了一整個深秋，月不出戶；<sup>58</sup> 在主人留客的權力遊戲中，不得不說是一大劣勢。

剛到武昌時，曾植因寓中有雙梧，題寓屋曰「雙梧閣」。詩人作〈雙梧〉一題，有句「識琴倘來焦尾後，削杖未死催心時」，<sup>59</sup> 以此木品質自喻，最稱警策。己亥年末，由於多愁多病，改室名為「苻婁庭」。「苻婁」，病木，無枝而有瘤，不再堅忍。沈氏自作〈苻婁庭漫稿自序〉曰：

余尪羸積年，有同玄晏。感盧升之〈病木賦〉意，乃名其園曰株園，室曰苻婁庭，偃息安般，消寒視蔭，偶有所感，輒綴數言，以居命之為《苻婁庭漫稿》。<sup>60</sup>

盧照鄰（約 634-689）的〈病梨樹賦〉在「枯木詩學」裡為一特殊典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卷 4，頁 22。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sup>57</sup> 以上引文，見〔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冊 5，卷 61，頁 1401。

<sup>58</sup> 「己亥，……張香濤館公城南水陸街之姚園……深秋病瘧，逾月不出戶。」（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見王雲五主編，王蘧常著，《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34。

<sup>59</sup> 沈曾植，〈雙梧〉，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 204。

<sup>60</sup> 沈曾植，〈苻婁庭漫稿自序〉，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 11。

型，它讓我們聯想到生病的身體，誘發著痛苦。<sup>61</sup> 曾守仁指出此係沈氏的維摩示疾，由一己通向國體，而「癩木」亦可以自生，託命吟詠，進而成其為「魁傑」。<sup>62</sup> 此論極高明，我們則試著道中庸，以不同途徑接近一名偉大的詩人心靈——此老猶龍。苻婁詩什中惟獨一首〈臥病簡抱冰尚書〉，通篇不作呻吟語，透過詩歌創作常見的身份轉換，作一小小自解：

口腹猶疑累世間，高居何用稱便安。秋心總愧黃華傑，天運長知柏石艱。契濶清游虛月夜，嵯峨憂緒極乾端。尚書萬病醫王手，肯與維摩發藥看。<sup>63</sup>

晚清國力孱弱，激發了身體即國體的投射，淬魂練體，方可救國。士君子病體不祥。只有切換到佛教的文化語境中，曾植得以自比維摩，嵯峨憂極，因為擔心戊戌以來變局（「天運」），病憂天下，試圖為自己的纏綿病榻作小小開脫。擬張氏為大醫王，堪為敵體，雖佔身份，已露恭維之意。在兩人有限的接觸裡，沈氏原先的高姿態不得不逐漸轉變。

此年十二月廿一日，張之洞以節鎮之尊於青山操練，大閱軍隊，是夜招飲楚材輪。對於麾下諸人——尤其是書院師生——而言，職責上不必參與，惟張之洞好大喜功，期盼來人，又不好拿出賓主相壓，故言辭頗為曲折。張氏有信致兩湖書院院長梁鼎芬，略云：

再，青山閱操一節，恐執事願率諸生往觀，故以奉告耳。地段

<sup>61</sup> 「庾信將生活在空虛心境中的自我形象同化於枯樹意象，而盧照鄰這裡，則病樹首先是直接象徵自己生病的身體。它明顯誘發了痛苦」。參見興膳宏，〈枯木上開放的詩——詩歌意象譜系一考〉，收入蔣寅編譯，《日本學者中國詩學論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196。

<sup>62</sup> 曾守仁，〈支離癩木撐風煙：論同光魁傑沈曾植〉，《惡世界裡的抒情：清末民初詩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年），頁91-139。

<sup>63</sup> 沈曾植，〈臥病簡抱冰尚書〉，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237。

廣闊二十餘里，觀者與行間有職事者，各不相謀，無所謂賓主也。來示有相陪之語，因憶夏間城南閱操，尊意亦有陪往之語，恐係誤會，故并及之。<sup>64</sup>

此役共出動五千餘人，武備、兩湖諸生從者百餘，浩浩蕩蕩。沈曾植、梁鼎芬拂曉即往，張之洞日斜而至，操練完畢，夜宴時梁、沈、紀鉅維（1848-1920）、鄭孝胥依舊陪侍在座，三鼓方歸武昌。<sup>65</sup> 曾植有〈南皮公青山大閱偕節庵往觀〉、〈南皮公霜郊校射即席呈賦（一作〈抱冰堂夜集記言〉）〉等相關作品，意態與此前迥異。詩曰：

〈南皮公青山大閱偕節庵往觀〉

鑿鼓三傳晦霧開，信知人定自天回。成軍三楚多君子，受射諸郎有雋才。馬足簫雲高嶺度，虬髯照雪令公來。視新聽眇無窮意，藏密先後九地推。

年少未騎生馬駒，老跨款段從駒駝。森嚴師子聞荆楚，習積機關較墨輪。身手世間須攫搏，罪言往事重嗟吁。鯁生壯事終無分，慚愧山前識壘圖。

〈南皮公霜郊校射即席賦呈〉

世間擺競工倕指，拱手與人家國事。西來老胡歌文康，手摩日月天氏昂，神通千臂不可量。顧視若菌民，折箠鞭衆羊。抱冰老人校兵返，置酒樓船中飲嘆。為將古語例今情，頭目須要手足捍。古彊有足無足判，今彊有手無手斷。長兵倍身助遠攻，志慮血氣程其弓。行不能持射不中，有臂乃與子子同。家具犀

<sup>64</sup> [清]張之洞，〈致梁節庵先生〉（其十六），趙德馨主編，吳劍杰、馮天瑜副主編，吳劍杰、薛國中、彭忠德、魯毅、李珠點校，《張之洞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年），冊12，頁81。

<sup>65</sup>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冊2，頁746。

渠戶鶴膝，藏器在民民載國。千人所指氣成瘡，何況神珠加手力。宗廟齊豪獵齊足，吾願編氓齊手握。機關便習合形骸，招的無虛如土肉。恒河沙界火人伏，彈雨槍林藏比屋。挾岱擘華一舉勞，裂驚摧獅惟所欲。無足之國敵所蹂，有手之國恣旋抽。手能強心目導手，天下正在十指頭。公言切復切，吾意猶未畢。安得一目之民兩厥明，歧舌之民壹厥聲。域國毒消鬼國曉，大鈞一鑄形天貳負謹頭鑿齒蕩滌無留形。世間萬物待回斡，天地南北猶虧傾。黃河可塞金可成。祝公難老加餐飯，歲歲霜郊校射行。<sup>66</sup>

首題「虬髯照雪」寫制軍威儀，氣象不凡，其餘不論歌頌「成軍三楚多君子，受射諸郎有雋才」的兩湖健兒，或者抒發「鰕生壯事終無分，慚愧山前識壘圖」的感歎，中規中矩，均為題中應有之義。

前一題詩語清切，後一題〈南皮公霜郊校射即席呈賦〉七言長古廿一韻，一作〈抱冰堂夜集記言〉，題「即席呈賦」、「夜集記言」可知，是詩人撮略張之洞此夜談話，當筵賦詩上呈。詩中用典纍纍，閱操勞累一日，博學稽古的詩人仍有捷才。沈曾植強打病體，渲染制軍胸襟、見識，將他的頭目手足之喻化洋洋灑灑十二韻，兼以自炫。末句「祝公難老加餐飯，歲歲霜郊校射行」，祝禱語，不以精鍊求之。詩雖通篇用典，至此曲終奏「俗」，如此賓主應酬堪稱得體。

不必指責或追問詩人是否有意折腰屈膝，生存所需的一切已無孔不入地鎔鑄著自己。得體，語本《禮記·仲尼燕居》：「官得其體。」孔穎達（574-648）疏：「謂設官分職，各得其尊卑之體。」<sup>67</sup> 陳三立

<sup>66</sup> 以上引文，分見沈曾植，〈南皮公青山大閱偕節庵往觀〉，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 275-276；〈南皮公霜郊校射即席呈賦〉，上冊，頁 277-279。

<sup>67</sup> 以上引文，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禮記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冊 15，卷 50，頁 1615、1617。

有類似的一題應酬之作，即因不得其尊卑之體，致憾於主人：

廣雅於伯嚴詩尤多不解，有〈九日從抱冰宮保至洪山寶通寺餞送梁節菴兵備〉云：「嘯歌亭館登臨地，今日都成隔世尋。半壑松篁藏梵籟，十年心迹比秋陰。飄髯自冷山川氣，傷足寧為卻曲吟。作健逢辰領元老，下窺城郭萬鴉沈。」此在伯嚴最為清切之作，廣雅不解其第七句，疑元老不宜見領於人。<sup>68</sup>

張之洞不喜「作健逢辰領元老」一句的詰屈，批駁「領」字，「謂何以反見領於伯嚴也」，<sup>69</sup> 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認為張、陳意見相左，根本癥結不在語序，而在於「陳三立的詩反映了傳統社會秩序的顛覆，這種顛覆未必是他所願見、倡導或者願意容忍的」。<sup>70</sup> 沈曾植〈南皮公青山大閱偕節庵往觀〉、〈南皮公霜郊校射即席賦呈〉一賦再賦，已呈現了賓客對幕主得體的順隨，不再是初入幕時「議論往往不合，亦無如我何」的高蹈。

張之洞強調正統秩序的詩歌審美標準，一言以蔽之：「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陳三立、沈曾植皆擅江西詩風，同樣被張氏點為「我所不解」之流。<sup>71</sup> 義寧公子，遊於兩湖，身份更接近座上客，既無所求，論詩不合亦無妨。沈曾植則大不相同。當年考御史，

<sup>68</sup> 陳衍撰，張寅彭、戴建國校點，《石遺室詩話》，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冊1，卷11，頁156。

<sup>69</sup> 陳衍撰，張寅彭、戴建國校點，《石遺室詩話》，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冊1，卷18，頁252-253。

<sup>70</sup> 〔美〕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著，黃喬生譯，《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舊派」詩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頁180。

<sup>71</sup> 「廣雅相國見詩體稍近僻澀者，則歸諸西江派，實不十分當意者也。蘇堪序伯嚴詩，言『往有鉅公，與余談詩，務以清切為主。於當世詩流，每有張茂先（按：232-300）我所不解之喻』。鉅公，廣雅也。其於伯嚴、子培及門人袁爽秋（昶）（按：1846-1900），皆在所不解之列，故於〈送子培赴歐美兩洲〉則云：『君詩宗派西江傳，君學包羅北徼編。』〈過蕪湖弔袁滙珍〉則云：『江西魔派不堪吟，北宋清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以上引文，見陳衍撰，張寅彭、戴建國校點，《石遺室詩話》，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冊1，卷11，頁156。

由於文章古奧，歷塊一蹶，主試者正是張之洞，如今又為賓主，俯仰隨人。在武昌，張之洞論及曾植詩藝，評曰「沈培老詩學深，自是極好，惟有過深之處」，張氏門人曰「乙老亦深於山谷者，與公不甚合也」。<sup>72</sup> 此評實際上仍是一種象徵暴力之行使，沈曾植想必曾經聽聞其說，而且十分在意，如鯁在喉。

根據陳衍〈沈乙盦詩序〉，早在戊戌年，幕中的沈曾植便曾提及：「吾詩學深，詩功淺。夙喜張文昌、玉谿生、《山谷內外集》，而不輕詆七子」，<sup>73</sup> 那必然是對張之洞說法的直接反應，如非時時在喉頭、心頭，「詩學深」三字譽斷不輕易出於己口。曾植對陳衍解釋的「詩學深者調閱詩多，詩功淺者作詩少也」，<sup>74</sup> 巧妙扭曲了「過深」的入魔之歎，同時也用「詩功淺」保留自己移步換形的餘地。陳衍接著勸沈曾植觀摩梅宛陵（梅堯臣，1002-1060）、王廣陵（王令，1032-1059）詩作，要對治「黃病」，梅、王二味不啻一帖清涼劑，「『君愛艱深，薄平易，則山谷不如梅宛陵、王廣陵』，君乃亟讀宛陵、廣陵」，<sup>75</sup> 幾乎是王仁堪、梁鼎芬故事的翻版。

不過，曾植一時似未能心領神會，只是「間一為之」，直到己亥入秋病瘧，幾月來連番碰壁，他才恍然大悟，「遂日有所作，或一日數誇示之，或夜三四鼓猶打門送詩。不兩三月，已積百餘首」。<sup>76</sup> 可惜《海日樓詩集》中，兩人秋冬唱酬，僅存〈答石遺四首〉、〈石遺過談去後簡之〉、〈奉呈石遺〉、〈寒雨悶甚雜書遣懷襃積成篇為石遺居士一笑〉四題，意此際必有效「北宋清奇是雅音」者，而沈詩之精彩處

<sup>72</sup> 以上引文，見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讀廣雅堂詩隨筆〉，《蒼虬閣詩集》，頁340。「詩學深」一評亦出此文。

<sup>73</sup> 陳衍，〈沈乙盦詩序〉，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12。

<sup>74</sup> 陳衍，〈沈乙盦詩序〉，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12。

<sup>75</sup> 陳衍，〈沈乙盦詩序〉，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12。

<sup>76</sup> 以上引文，見陳衍撰，張寅彭、戴建國校點，《石遺室詩話》，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冊1，卷1，頁18-19。

「聲牙鉤棘中，時復清言見骨，訴真宰，盪精靈」，<sup>77</sup> 石遺有力焉。二人唱酬詩中還可見陳氏不厭其煩地提示，「淡遠深微有本真，鏤金錯采費精神。西江未必涪翁拜，何況桐城一派人」；<sup>78</sup> 曾植有答詩先有「瓣香何敢廢涪皤」，再有「辛淡甘鹹都自可」等句，<sup>79</sup> 山谷山谷，如何之處，心思活動痕跡斑斑可考。

此年十二月二十日，大約就在兩三月後，沈曾植有書致梁鼎芬，一名比他更接近府主張之洞的親信。此札今為殘件，但內容頗堪玩味：「委蛇澹永，主客同軌，為鄙人微旨已達乎？抑偶然闇合乎？請公論之。」<sup>80</sup> 主客為誰，微旨如何，何物為餌？試探梁氏，總是讓我們不自主地聯想及他身後的巍巍總督，由於信件有關，謎底已未可知。唯一留下的線索「委蛇澹永」，風格也，而我們記得宋詩的平澹之宗，「真正在詩學上始終倡導平淡並付諸實踐的」，<sup>81</sup> 首推宛陵。

話說回來，「不兩三月，已積百餘首」，其實不符合沈曾植的守制人身份，丁憂其間，原不該吟風弄月（「制中不為韻語」）。何以有此，仍可請益布氏：「只有在與一個場域的關係中，一種資本才得以存在並且發揮作用。」<sup>82</sup> 身為孝子，理應輟筆，然而，力爭上游的幕府詩人不但須閉門覓句，更要出門送詩。病瘡的這一年秋冬，沈曾植頻繁與陳衍、鄭孝胥唱和，同光詩派快速凝聚發展起來。論者認為，「此時的鄭孝胥、沈曾植、陳衍來往頻繁，詩文酬唱，互相切磋詩藝，對宋詩的相同愛好拉近了他們的距離」。<sup>83</sup> 三人來往，與其說為愛好所

<sup>77</sup> 陳衍，〈沈乙盦詩序〉，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12。

<sup>78</sup> 陳衍，〈調子培並答惠詩〉，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248。

<sup>79</sup> 以上引文，分見沈曾植，〈答石遺〉，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246；〈石遺過談去後簡之〉，上冊，頁248。

<sup>80</sup> 沈曾植，〈與梁鼎芬〉（其二），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161。

<sup>81</sup>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334。

<sup>82</sup> 〔法〕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美〕華康德（Loïc Wacquant）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頁139。

<sup>83</sup> 楊萌芽，〈幕府論詩：張之洞幕府與宋詩派文人群體的聚合〉，《古典詩歌的最後守望：清末民初宋詩派文人群體研究（1895-1921）》，頁68。

致，不如說在張幕之中，他們都需要持續累積人脈，迎合某種詩文主流，以求上進。人脈即是一種社會資本，作為行動者的沈曾植、陳衍拉上鄭孝胥，共同創建了這段關係。初見陳衍，沈氏說道：「吾走琉璃廠肆，以朱提一流購君《元詩紀事》者」；陳衍回曰「吾於癸未、丙戌間，聞可莊、蘇堪誦君詩，相與歎賞，以為同光體之魁傑也。」<sup>84</sup>可莊逝矣，蘇堪正在，三人不斷彼此投資、長期經營、有意識的籠絡、交往，見諸唱和篇章。沈曾植得到了重要的提示，「平易」二字的入門之階，筆路有變，陳衍因交往名流，增其身價（自比「長江見白難為客，東野於韓詎在旁？」）。<sup>85</sup>鄭孝胥雖與沈曾植為京師舊識，但這時才有機緣、有需求深入結納。沈曾植總是擔憂「抱冰似無留客意」；<sup>86</sup>鄭孝胥剛以候補同知見知於張之洞；陳衍則如前所述，為始終「未入流」的官報局編纂。作為策略性行為，三人締盟、互相標榜——累積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無疑是競爭、佔位的必要之舉；贈詩、論詩及風格調適，醉翁之意，不妨在「壺」（張之洞一號壺公）。

陳衍曾讚沈曾植為「同光體之魁傑」，惟己亥以前，海日詩囊蕭瑟，「索君舊作，則棄斥不存片楮矣」，「詞章若不屑措意者」。<sup>87</sup>此後沈、陳、鄭唱和不休，沈詩數量、風格一變，才算得上名實相符。不過，陳衍後來回憶這段過程時，悄悄刪去了「魁傑」二字。當時「明

<sup>84</sup> 以上引文，見陳衍，〈沈乙盦詩序〉，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12。

<sup>85</sup> 陳衍，〈次韻答子培〉，此詩沈曾植給予佳評曰：「生勁乃類文湖州，筆妙真不可測。」此外投贈諸作，沈評還有「真是香山風味」、「事理相扶，昭彰朗徹，諷詠再三，不能去手。兩牕沉悶，欲繼雅音，而抽思不續」、「別具町畦」、「斬新」、「真北宋人語，王梅間左挹而右拍矣」等評論，當時必然博得陳衍一笑，後亦一一錄入其詩話。此亦累積社會資本之一例。以上引文，見陳衍撰，張寅彭、戴建國校點，《石遺室詩話》，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冊1，卷11，頁168-169。

<sup>86</sup> 沈曾植，〈與李逸靜〉（其二十五），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112。

<sup>87</sup> 以上引文，見陳衍，〈沈乙盦詩序〉，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12。

明是挾沈以自重」，<sup>88</sup> 後來天下侯王一手封的石遺老子，連本帶利討回，毫不手軟。無論如何，三人同倡「三元說」——開元、元和，以及想當然爾的元祐——貫通唐宋，理論步步成型，沈曾植論詩詩〈寒雨積悶雜書遣懷褻積成篇為石遺居士一笑〉八十韻之功不可抹滅。雖然論詩、贈詩的實踐，不免意中有府主一人在，但他未曾於文學、權力糾葛的場域中被吞沒，喪失自我。一個重要的證據是，南北朝兵戈分裂，在聲音之道與政通的前提下，張之洞幕府賓主力倡「哀六朝」，那是「公平生學術宗旨所在」。<sup>89</sup> 曾植卻在「三元」之外，始終把守屬於自己的最後一關：「吾嘗謂詩有元祐、元和、元嘉三關……此秘密平生未嘗為人道，為公（按：金蓉鏡）激發，不覺忍俊不禁。勿為外人道，又添多少公案也」。<sup>90</sup> 學者陸胤以此定三人之優劣：

然而，沈曾植在張之洞幕中深自韜晦，將自己的詩學發現（按：指元祐、元和、元嘉「三關說」）視為獨得之秘，「平生未嘗為外人道」。一面則反而為陳衍等鼓吹「三元說」，截斷眾流從「開元」講起（「開、天啟疆域」），而絕口不談張之洞所深惡之「六朝」。則其用心之深與擇術之慎，又非陳衍、鄭孝胥輩一味附和者所能比擬。<sup>91</sup>

那是在知識與權力的糾結下，一名讀書人的風骨與清明。

<sup>88</sup> 錢仲聯，《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83年），頁112。

<sup>89</sup> 陳曾壽語，收入〔清〕張之洞著，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增訂本）》，下冊，頁641。

<sup>90</sup> 沈曾植著，錢仲聯編校，〈與金潛廬太守論詩書〉，《海日樓文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9年），卷1，頁29。

<sup>91</sup> 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頁244。

## 五、庚子年（1999）：賓主關係又一變

### （一）病僧：自我神秘化

在內心保持自我澄清的同時，沈曾植也弔詭地以一首奇詩進行了外在的自我神秘化。沈氏《海日樓札叢》記前輩儒者吳廷棟（1793-1873）語曰：「不干求易，不受人牢籠難，不受牢籠而仍不涉矯激尤難。」<sup>92</sup> 武昌幕中，沈氏為「京師名流」，謔稱「京流子」。<sup>93</sup> 流，品也；流，又五刑之一，放逐也。曾植初非南皮親信，「放逐」至此，要佔一地位不易；身是客卿，不免俯仰隨人。面對幕主同仁可能存在的大小猜忌，經歷掙扎、融入、調適，庚子春日，終於逼出了《海日》一集中最稱奇偉的〈病僧行〉。

沈氏此際選擇以「病僧」身份示現，傾力作詩，與稍早的「病摩詰」有小異。張之洞對佛教思想並不關心，沈曾植心中的理想讀者另有他人：他要以一詩力壓鄂幕諸賢。幕中諸人多吟壇健將，或合作，或排擠，高手過招，一出於詩。陳衍與張之洞賓主齟齬，梁鼎芬的「硬差歸里」是一絕好例子：

方家君與廣雅齟齬時，將一人入都。……梁節菴以為家君決去也，將武昌府師範學堂積欠薪水補送二百金來，號稱草堂貲，並撰〈草堂聯句〉云：「寫經齋近鄰堪買，滄趣樓高衡可望。」硬差歸里，下語可謂工切矣！<sup>94</sup>

欠薪與聯語一齊送來，十四字即是一道噤言咒，止止不須說。明乎此，讓我們隨眾人一起回到〈病僧行〉創作背景。沈曾植詩及序如下：

<sup>92</sup> 沈曾植錄吳拙修語，見沈曾植著，錢仲聯輯，《海日樓札叢（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53。

<sup>93</sup> 以上引文，見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註》，頁92-93。

<sup>94</sup> 陳聲暨、王真編，《石遺先生年譜》，卷4，頁161-162。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詩作于庚子之春，是羣言競起，卧病江潭，有感而作。請沈大令塘為畫《寒林坐臘圖》。

病僧病臘不記年，臆對或自風壇前。蒙戎敗葉擁床敷，支離癭木撐風煙。六師派別謬占度，休糧恐是金頭仙。毗藪紐天攝不得，首羅三目眈相看。洗心竭來歸佛祖，縛律非律禪非禪。含生大期百二十，四百四病根荏全。水氣為瘡木氣瘡，蛾綠斧性裘媒寒。膏粱奧博物有致，此理未可通窮療。華子中年病忘久，明心晦惑來無緣。假從毗耶示化儀，不爾五行同人天。娑婆世界一音隔，安有萬二千眾天龍八部相周旋？檀闕失莊嚴，忍虧無強堅。貪欲羸老基，嗔恚疚災牽。得非夙因招現果，突吉羅業雖有懺悔猶沈綿。給孤獨園峭嶸山，雁王鹿女遊其間。小花正如普陀白，高窟或是毗沙刊。臘居雪嶺夏熱泉，一瓶一鉢疲往還。或有造其關，草枯木石頑。九十六道諍研研，六十四書文複繁。莊嚴劫過，星劫未來，恒沙譬喻不可罄。像法五百盡，末法三千延，病僧病久心茫然。蘇迷廬山芥子小，石女行歌木兒笑，嵐風撼松藤裊裊，幻師善幻五色宣，畫師作畫一筆圓。瘦骨秋嶺岿，脩脩野鵲巢其顛，後來合有棲迦傳。<sup>95</sup>

題曰「病僧」，一般僧之出家，重病者「屎尿縱橫，舉房臭穢」，僧團對策為「弟子應看和尚，和尚應看弟子」。<sup>96</sup> 首句「不記年」、「風壇前」，即將現實困境抒情化。此不記年之僧人，並非多忘，蓋有了脫生死之神通。

「六師派別謬占度」是此該詩關鍵句。錢注引《維摩詰所說經》：「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迦梨拘賒梨子，刪闍夜毗羅胝子，阿耆多

<sup>95</sup> 沈曾植，〈病僧行〉，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300-306。

<sup>96</sup> 以上引文，見劉苑如、羅珮瑄、邱琬淳，〈歷代僧傳疾病敘述的數位研究——從僧人壽考談起〉，《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30卷第2期（2020年6月），頁14。

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馱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sup>97</sup> 眩人眼目，其實六師何指，觀者都不必、也不能知曉，詩人已說「占度」為「謬」。那隱然指南皮幕客的猜疑：常熟門下士，來此何為？看似唱酬融洽的幕府諸人，尚有梁鼎芬扼之於先，易順鼎扣款於後，並世相知妒道真。由京官入幕，他很清楚自己終是外人，譬如日後在滬，盤算「梅生一席，近似盛氏私人，常州人希覬者甚多，輕受之，豈得不虞後患」；在南京，「外人或以新甯（按：劉坤一）特招屬耳目，甚不願多酬應，然不能免也」。<sup>98</sup> 曾植戲請鄂中諸人不必妄猜，十地菩薩境界原非九地菩薩可知。

僧人自言，既非肉體凡胎，自度「恐是」西域金頭仙人，神光離合，總不肯落實。「休糧」，辟穀，仙家修行術，曾植寫來瀟灑，其實他迫於生計入幕，瘦如支離槐木，張之洞幕下待遇微薄，難辭其咎：

又憶劉忠誠薨，張文襄調署兩江，當時因節省經費，令在署幕僚皆自備伙食，幕屬苦之，有怨言。

張（按：之洞）宮保屬吏，至今猶是勞人草草，拮據不遑。而（按：盛宣懷）宮保僚屬，即一小翻譯，亦皆身擁厚貲，富雄一方。是以見張宮保之不如宮保多多。<sup>99</sup>

「毗藍天攝不得，首羅三目眈相看」，再描武昌主客圖。「毗藍天」，佛教守護之神，以其神力，變現十種形態，「……友、父、恩寵者」，<sup>100</sup> 豈非幕主形象（雖有神力，而「攝不得」我）？摩醯首羅面

<sup>97</sup> 沈曾植，〈病僧行〉，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301。

<sup>98</sup> 「梅生」指南洋公學總理何嗣焜（1843-1901），1901年沈曾植應盛宣懷之邀，赴滬代理此職。以上引文，分見沈曾植，〈與李逸靜〉（其四十），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124；〈與李逸靜〉（其三十五），頁121。

<sup>99</sup> 以上引文，見黃興濤等編譯，〈張文襄幕府紀聞〉，《辜鴻銘文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上冊，頁429、430。

<sup>100</sup> 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冊4，頁3853。

上三目，「眙」，錢注引《說文》：「直視也。」實亦兼有驚愕意。<sup>101</sup> 如此詩功，合當技驚四座。

「洗心竭來歸佛祖」，<sup>102</sup> 願追求、皈依更高的存在，不爭凡俗。往下廿韻，佛語翻騰，理趣盎然，果然值得曾植「深負自喜」。<sup>103</sup> 詩成，題於友人沈塘（？-？）為其所繪《寒林坐臘圖》上。當觀畫的同僚仍爭嘲著圖中「或肉倍好，或好倍肉，或肉好若一，或匿笑其不圓」<sup>104</sup> 的僧笠，沈曾植卻如宗門龍象一般於詩末給出了充滿機鋒的開示：「畫師作畫一筆圓」。他將自我的真容藏在幾頂圓笠下，如同這首讓人「欽其寶，莫名其妙」的偉大詩作，<sup>105</sup> 跨過眾人，他將自我神秘化（self-mystification）了——僧袍上繡一朵朵西域曼荼羅。

## （二）說客：庚子之後，事功之始

甲午戰火，中日啟釁，沈曾植是翁同龢論天下事時許為知言之二三子；<sup>106</sup> 他曾主張遷都襄陽，又於和議後請借英款創辦東三省鐵路。<sup>107</sup> 維新期間，曾植以京師名流佐康、梁變法，展現了強烈的用世心，然而皆無所成。幕府是書生用事的利名場，成敗由人，1897年，張之洞署理兩江總督，沈曾植至交張謇（1853-1926）於南京幕中佐政，大破大立，狀元實業生涯由此開端，適以「瑞記紗機」事引發爭

<sup>101</sup>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字典縮印本》（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昌：湖北辭書出版社，1993年），頁1038。

<sup>102</sup> 沈曾植，〈病僧行〉，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301。

<sup>103</sup> 陳衍撰，張寅彭、戴建國校點，《石遺室詩話》，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冊1，卷26，頁355。

<sup>104</sup> 沈曾植，〈病僧行〉，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300。

<sup>105</sup> 以上引文，見陳衍撰，張寅彭、戴建國校點，《石遺室詩話》，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冊1，卷26，頁355。

<sup>106</sup> 「知此意者培、衡兩君也」，翁同龢，〈翁同龢致張謇函〉（其十三），楊立強、沈渭濱、夏林根、管霞起、黃稚松編，《張謇存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673。

<sup>107</sup> 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頁171、173。

議，致信舊友大吐苦水——<sup>108</sup> 到了沈曾植自己去向武昌，孰知求為張謇而不可得。

戊戌五月初九，舟過蕪湖，越一日抵鄂，六月下旬，沈氏致書南皮門下高弟、京中舊交袁昶：

植來此匝月……世事無足言，昔人譬講席於祠祿，此後化山林為朝市矣。林無靜柯，可為喟息。<sup>109</sup>

「祠祿」，宋制，指朝廷優容罷職的大臣為宮觀使，給予俸祿。對丁憂賦閒的志士而言，只登上兩湖書院史席，不入鄂之政事堂，既如祠祿，又難免紅塵紛擾，委實讓人喪氣。更有甚者，宋元以來，書院學堂例設山長，講學外兼統領院務。晚清重臣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治下的書院，呈現了邁向現代化的階段特色，為強化督撫的文教功能，他們以政領學，廢除山長，造成賓幕的私人僚屬化，書院中人逐漸失去客卿的獨立超然。<sup>110</sup> 晚清府主權力不斷擴張，辜鴻銘（1857-1928）曾有歎曰，「大人待下屬一節，今日在官場者當自知之，更不待余解說」，並轉引袁枚（1716-1798）語，吾輩中人乃「為督撫作奴才」也。<sup>111</sup>

沈曾植不懈地玩著武昌幕中的佔位遊戲，無奈種種，好像沒能讓他上升到更理想的位置，登堂入室。即使在詩文最值錢的抱冰堂裡，布氏學說亦不靈。人生不是理論，人生往往無理，至少他在門邊站到了最後，勉強佔住一席之地，期待事有轉機。皇天不負苦心人，庚子春賦罷〈病僧行〉後，沈曾植竟直接面臨了一生中參與天下事之巔峰。該年春夏之間，義和團運動逐漸高張，殺洋人，燒教堂，各國調兵入京；曾植四月服闋，原擬入都，因逗留上海；五月，清廷以光緒帝

<sup>108</sup> 詳見易惠莉，〈從張之洞所購「瑞記紗機」到張謇創辦大生紗廠〉，收入上海中山學社編，《近代中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8年），第29輯，頁143-183。

<sup>109</sup> 沈曾植，〈與袁昶〉，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407。

<sup>110</sup> 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頁277-282。

<sup>111</sup> 以上引文，見黃興濤等編譯，〈張文襄幕府紀聞〉，《辜鴻銘文集》，上冊，頁440-441。

(1871-1908)名義頒佈宣戰詔書，八國聯軍勢不可遏。東南諸大僚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李鴻章等知兵燹不可開，謀畫「中外互保之策」，<sup>112</sup>而穿針引線，居間奔走者，至少有趙鳳昌(1856-1938)、張謇、陳三立、沈瑜慶(1858-1918)、湯壽潛(1856-1917)、梁鼎芬、何嗣焜、施炳燮(?-?)諸人，沈曾植亦居功厥偉。沈氏門人王蘧常(1900-1989)《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記曰：

公……力疾走金陵，首決大計於兩江總督劉峴莊(坤一)，來往武昌，就議於兩湖總督張香濤(之洞)，而兩廣總督李少荃(鴻章)實主其成……，大局轉危為安，乘輿重反，繫公之力為多。<sup>113</sup>

作者並引其父王部畇(?-?)親聞於盛宣懷的內情，「峴帥意識堅定，香帥則志尚游移，非子培為香濤所素服，猶未能速決也」。<sup>114</sup>「素服」未可知，「速決」必有功。江上飛檄，說客往來，輪船重過小姑山，楚中山川神靈一時顏色明白起來：

城中始教尊天鬼，善賈多財炫報祈。山海荒冥多帝女，樂歌肸鬩動靈旗。江為羅帶當風去，月印粧娥攬鏡歸。蹴踏閒情憑壯語，彭郎真解小姑圍。<sup>115</sup>

沈曾植〈五月十一日重過小姑山〉末句閒情中有壯語，解天下之圍，下一「真」字，躊躇滿志。這一次，詩人終於想起四十年前的曾李幕府、湘淮名將的風起雲湧。

庚子五月三十日，《東南保護約款》制定，挽救了半壁生靈甚至

<sup>112</sup> 王雲五主編，王蘧常著，《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頁37。

<sup>113</sup> 王雲五主編，王蘧常著，《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頁36-37。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sup>114</sup> 王雲五主編，王蘧常著，《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頁37。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

<sup>115</sup> 沈曾植，〈五月十一日重過小姑山〉，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冊，頁320-321。

整座江山，這一場大功誰屬，卻一直言人人殊。沈曾植對此異常低調：「此事公不敢居其名，人問之，輒曰：『是寔張劉主持，與書生何與？』」王譜解釋道，「以奇痛在心，事成不居」，<sup>116</sup> 乃想當然爾。此際沈氏夫妻通信，不言家國奇痛，倒是有「戲法還沒變完」等風涼語，信中更記下幾番脣舌之爭：

日報復造我南洋密保謠言，此間衆口流傳，又惹抱冰吃醋，此沈藹蒼（按：1858-1918，名瑜慶）所為，甚無謂，果有此事，又費躊躇矣。<sup>117</sup>

天下一亂，奇策、詭計與謠言霎時湧現，張香帥作為國中支柱，迎鑾南下乎？勤王入衛乎？甚或在某些僚屬的密謀耳語裡，有著更令人咋舌的度外舉事？局中人陽奉陰違，翻雲覆雨，究中實情殆不可知矣。<sup>118</sup> 無論如何，在東南聯省互保這一層次上，穿梭於其中的沈曾植，此時才真正一償宿願，「脫去名士面目」，<sup>119</sup> 以一身介入天下。

辛丑（1901）正月、二月間，中外議和，對內，朝廷有求變法、行新政之詔。東南督撫盱衡局勢，各自預備新政奏稿，由於動見觀瞻，張之洞、劉坤一決意聯銜會奏。劉氏先召張謇、沈曾植、湯壽潛等擬稿，沈居其一，或許是上述「首決大計」之功；張則擬用鄭孝胥、勞乃宣（1843-1921）、梁鼎芬、黃紹箕（1854-1908）四人。沈稿其目凡十，曰：設議政、開書館、興學堂、廣課吏、設外部、講武學、刪則

<sup>116</sup> 以上引文，見王雲五主編，王蘊常著，《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頁37。標點符號為筆者所加。「公不敢居其名」一事亦繫此。

<sup>117</sup> 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頁237。

<sup>118</sup> 就中委屈，詳參戴海斌，〈「題外作文、度外舉事」與「借資鄂帥」背後——陳三立與梁鼎芬庚子密筭補證〉，《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2011年3月），頁124-130。

<sup>119</sup> 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頁73。陸胤以沈曾植於1897年與丁立鈞（1854-1902）論變法事，寄希望於張之洞等疆臣，揚棄乾嘉考訂之學與咸同中興名臣事功之學，是為脫去名士面目，極有見。然而，即使在張幕中，沈曾植於世局初無用武之地，遑論親與變法；情況改觀，要等到庚子、辛丑亂局的出現。

例、重州縣、設警察、整科舉，洋洋灑灑八九千言。<sup>120</sup> 劉坤一稱曰：

鄙見張、湯稿宏深博大，意在一勞永逸。惟積習太深，一時恐難辦到。沈稿斟酌損益，補偏救弊，較為切要，其中只科舉、學堂分途考試，不廢八股，尚須酌改耳，似可用沈稿為底本，再得我公斧正潤色，必卓然可觀。公前擬九條，皆救時良策，有沈稿所未及者，仍擬添入。江、鄂聯銜入奏，最為得體。<sup>121</sup>

沈曾植同年二月有〈與南皮制軍書〉，五月應召赴鄂商覆新政諭旨；六月，獻「美芹四策」，皆對張之洞大談變法。在沈稿基礎上，終由鄂中醞釀出近代史上著名的〈江楚會奏變法三折〉。<sup>122</sup>

沈曾植早年倡言變法，口燥舌乾，戊戌以後，更無復可言。直到拳亂打破僵局，才為南皮幕下這名史學教席帶來事功的契機。從前，主客總是話不投機。庚子四月服闕，路阻上海，前途未卜，沈曾植心心念念的是「史席聞尚在，未知的否」？「又多日未見抱冰，不知其意何若」？「香老近日憂悶，無復招延雅意」；「香老諸事一窘字蔽之，夜中門禁森嚴，故近日少見」；「抱冰似無留客意」，<sup>123</sup> 辛丑年大談變法後，或者酬論竟日，「時八下鐘至下午五下鐘而退」，<sup>124</sup> 或者是「南皮慮周藻密，談興甚濃」，主人殷勤留客，曾植想告別，還得要「陳情婉告，乃得成行」。<sup>125</sup> 由一封奏摺、一題詩作，可以清楚看見這一轉變。光緒二十七年（1901）十二月初一日，和局略定，鑾輿還京，

<sup>120</sup> 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頁 241-242。

<sup>121</sup> 劉坤一，〈劉制台來電〉，趙德馨主編，吳劍杰、馮天瑜副主編，吳劍杰、薛國中點校，《張之洞全集》，冊 10，頁 279。

<sup>122</sup> 可參李細珠，〈張之洞與《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歷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2002 年 4 月），頁 42-52。

<sup>123</sup> 以上引文，見沈曾植，〈與李逸靜〉（其十八、其二十、其二十一、其二十二、其二十五），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 105、107、109、110、112。

<sup>124</sup> 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頁 250。

<sup>125</sup> 以上引文，見沈曾植，〈與盛宣懷〉（其一），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頁 267。

張之洞明白新政將雷厲風行，而「新政之要，待人而行」，於是就其所知上奏，臚舉才識鴻達、一本忠愛者十二員，誠所謂精中之精。這封〈臚舉人才摺（并清單）〉裡，沈曾植赫然在列，考語曰：「思力深沉，學問淹雅」，<sup>126</sup> 日後推薦給同僚時，張氏之譽更盛：「今日纂律改律，若欲貫通古今，參會中外，變不失正，此人斷不可少，」<sup>127</sup> 直以國士目之，二人關係已不可同日而語。

張之洞〈臚舉人才摺〉進奏後，沈曾植果然獲用。張氏一向貴自矜重，從不輕易贈詩與人。陳衍最喜誇耀其恩遇，章士釗（1881-1973）有詩哂之：「見說鵷鷺冠下客，不教陳衍炫依嚴。」自注曰：「（按：張之洞）集中無與石遺詩。聞已詩亦不令陳和。」<sup>128</sup> 檢張集中，此際卻有〈送沈子培上節赴歐美兩洲〉兩首。詩曰：

海水東迴三萬里，同瞻日月共星辰。飛蓬漸覺風輪急，倚杵方憂劫界新。南北神功矜鑿竅，東西儀態誚工輦。平原賓從儒流少，今日天驕識鳳麟。

君詩宗派西江傳，君學包羅北徼編。管內果然擁廬蠹，輶車更欲壓英騫。蹉跎拙政慚佳客，絢爛秋花鬪別筵。善飯挽強都不敏，何勞異國問霜顛。<sup>129</sup>

「君詩宗派西江傳」，儘管山谷一脈的結習未盡，不過那已非重點，

<sup>126</sup> 以上引文，見〔清〕張之洞，〈臚舉人才摺（并清單）〉，趙德馨主編，吳劍杰、馮天瑜副主編，周秀鸞點校，《張之洞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年），冊4，頁48。

<sup>127</sup> 〈致江甯劉制台、保定袁制台〉：「鄙意更有欲舉者一人，外務部章京、刑部郎中沈曾植，學問博雅，於漢、隋、唐、明諸律，用功極深，當代無匹，鄙人曾與詳談。今日纂律改律，若欲貫通古今，參會中外，變不失正，此人斷不可少，」〔清〕張之洞，〈致江甯劉制台、保定袁制台〉，趙德馨主編，吳劍杰、馮天瑜副主編，吳劍杰、薛國中點校，《張之洞全集》，冊10，頁361。

<sup>128</sup> 以上引文，見汪辟疆撰，王培軍箋證，《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上冊，卷2，頁120。

<sup>129</sup> 〔清〕張之洞著，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增訂本）》，上冊，頁181。

沈曾植在張之洞身邊留到了最後，終究等來天下大亂，君子豹變。「鳳麟」、「佳客」，主人眼中的他，總算再非祠祿之流。出使歐美，踏上新政的風口浪尖，這一趟武昌總算沒白走一回。

## 六、結論

五大臣出洋事雖因革命黨的炸彈攻擊中輟，穿梭江上的龍拏虎擲已鑄入行動者第二天性，牽引其日後心態與抉擇。少了這一番經歷，我們很難想像光緒三十四年（1908），皇帝、太后相繼病亡，安徽城外炮軍趁機嘩變起事，一日之內敕平大難，守禦城上，「笑談而靖奇變，鄙人胸襟亦有自負者」，<sup>130</sup> 是其時以安徽提學使兼署布政使，剛到任不滿一年的前刑部郎中沈曾植。

如果沈曾植在武昌發展不遂，主人早早逐客，困在某個無名渡口，庚子以後，搖搖欲墜的古老中國會面臨怎樣的命運？古典詩史的終結，會不會來得更倉促一些？拿走「三元說」、拆卸《海日樓》，同光有體無魂，該是益發破碎、淺薄？佛曰一彈指，三十二億百千念，借鑑西哲之靈光，我們能發現場域中人的一言一行一念，無不由慣習而來，無不向資本而去，念念之間，國史、詩史又一度昏晨。它們永遠不如後見之明般的因果歷然，我們能夠看見浪潮，看不見局中人為爭一口飯，影響了一時風尚。

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訴說：在清末的政治風雷裡，沈曾植因母喪出都，幸脫戊戌政變。沈氏家貧，丁憂仍須謀館。湖廣總督張之洞有心招賢，但由於京師名流、常熟門人與身份，曾植格格不入，生計始終有憂。武昌主客僚友網絡裡，親疏遠近不一，眾人有時猜疑，有時投契。一名外來客費力地經營關係及詩藝，於此中艱難佔得一「席」之

---

<sup>130</sup> 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頁 332-333。

地。沈氏其詩從論道而起行，關乎生存心態，光宣詩壇門面一新，不得不說由鄂中賓主相激而出也。勉強佔位之後，忽逢奇變，從京師士大夫領袖而江上說客，事上磨練，也為他定下了日後行止——圓一場復辟大夢。

（責任校對：周皓熙）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龔抗雲整理，王文錦審定，《禮記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冊 1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 〔晉〕陳壽撰，陳乃乾校點，《三國志》，冊 5，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 〔南朝梁〕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年。
-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年。
-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
- 〔清〕李伯元，《南亭筆記》，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 年。
- 〔清〕李慈銘，《越縕堂日記》，冊 15、18，揚州：廣陵書社，2004 年。
- 〔清〕周錫恩著，陳春生點校，《周錫恩集》，武漢：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22 年。
- 〔清〕翁同龢著，翁萬戈編，翁以鈞校訂，《翁同龢日記》，冊 6，上海：中西書局，2012 年。
- 〔清〕張之洞著，龐堅校點，《張之洞詩文集（增訂本）》，上、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
- 〔清〕彭玉麟著，梁紹輝等整理，《彭玉麟集》，長沙：岳麓書社，2003 年。
-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冊 1、2，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 李詳著，李稚甫點校，《藥裏慵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

沈曾植著，許全勝整理，《沈曾植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21年。

沈曾植著，錢仲聯校注，《沈曾植集校注》，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沈曾植著，錢仲聯編校，《海日樓文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19年。

沈曾植著，錢仲聯輯，《海日樓札叢（外一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梁鼎芬，《節庵先生遺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陳衍撰，張寅彭、戴建國校點，《石遺室詩話》，收入張寅彭主編，《民國詩話叢編》，冊1，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陳曾壽著，張寅彭、王培軍校點，《蒼虬閣詩集》，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

楊立強、沈渭濱、夏林根、管霞起、黃稚松編，《張謇存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趙德馨主編，吳劍杰、馮天瑜副主編，吳劍杰、薛國中點校，《張之洞全集》，冊9、10，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年。

趙德馨主編，吳劍杰、馮天瑜副主編，吳劍杰、薛國中、彭忠德、魯毅、李珠點校，《張之洞全集》，冊12，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年。

趙德馨主編，吳劍杰、馮天瑜副主編，周秀鸞點校，《張之洞全集》，冊4，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年。

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註》，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

劉成禺撰，錢實甫點校，《世載堂雜憶》，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二、近人論著

毛慶耆主編，《近代詩歌鑒賞辭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

王雲五主編，王蘧常著，《清末沈寐叟先生曾植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

包亞明譯，《文化資本與社會煉金術——布爾迪厄訪談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曲金良主編，《中國海洋文化史長編：典藏版》，青島：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2017年。

李時人主編，《古今山水名勝詩詞辭典》，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李細珠，〈張之洞與《江楚會奏變法三折》〉，《歷史研究》2002年第2期，2002年4月，頁42-52、190。

汪辟疆撰，王培軍箋證，《光宣詩壇點將錄箋證》，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周裕鍇，《宋代詩學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尚小明，《學人遊幕與清代學術（增訂本）》，北京：東方出版社，2018年。

易惠莉，〈從張之洞所購「瑞記紗機」到張謇創辦大生紗廠〉，收入上海中山學社編，《近代中國》，第29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8年，頁143-183。

林志龍，〈1903-1905年英日航業長江航運競爭——以日本郵船收購麥邊洋行事件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26期，2006年11月，頁109-128。

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

宮留記，《資本：社會實踐工具——布爾迪厄的資本理論》，開封：河

南大學出版社，2010 年。

涂小馬，〈「同光體」研究綜述〉，《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8 年第 1 期，1998 年 2 月，頁 55-59、63。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莫礪鋒，〈一組同題共作的登塔詩〉，《莫礪鋒講杜甫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 年，頁 132-156。

許全勝，《沈曾植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陳聲暨、王真編，《石遺先生年譜》，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 年。

陸胤，《政教存續與文教轉型：近代學術史上的張之洞學人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年。

曾守仁，〈支離癭木撐風煙：論同光魁傑沈曾植〉，《惡世界裡的抒情：清末民初詩學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24 年，頁 91-139。

黃興濤等編譯，《辜鴻銘文集》，上冊，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年。

楊萌芽，〈幕府論詩：張之洞幕府與宋詩派文人群體的聚合〉，《古典詩歌的最後守望：清末民初宋詩派文人群體研究（1895-1921）》，武漢：武漢出版社，2011 年，頁 51-82。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字典縮印本》，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昌：湖北辭書出版社，1993 年。

劉苑如、羅珮瑄、邱琬淳，〈歷代僧傳疾病敘述的數位研究——從僧人壽考談起〉，《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30 卷第 2 期，2020 年 6 月，頁 5-29。

興膳宏，〈枯木上開放的詩——詩歌意象譜系一考〉，收入蔣寅編譯，《日本學者中國詩學論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 年，頁 179-209。

錢仲聯，《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濟南：齊魯書社，1983 年。

戴海斌，〈「題外作文、度外舉事」與「借資鄂帥」背後——陳三立與

梁鼎芬庚子密笥補證》，《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2011年3月，頁124-130。

嚴明編著，《沈曾植》，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

釋慈怡主編，《佛光大辭典》，冊4，高雄：佛光出版社，1988年。

〔法〕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美〕華康德（Loïc Wacquant）著，李猛、李康譯，《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法〕皮耶·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作，石武耕、李沅洳、陳羚芝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域的生成與結構》，臺北：典藏藝術家庭公司，2016年。

〔美〕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著，黃喬生譯，《微妙的革命：清末民初的「舊派」詩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

## The Poetry, Activities, and Inner World of Shen Zengzhi at the Wuchang *Mufu*

Chien-Ming Chen\*

### Abstract

The Tongguang style represents the magnificent conclu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it is marked by the emergence of many outstanding poets. The rise of this style was driven by the trends and demands of the mid-to-late Qing dynasty. In 1898, Shen Zengzhi became a member of Zhang Zhidong's staff at the Wuchang *mufu*, exchanging and discussing poetry with Chen Yan and Zheng Xiaoxu. Their camaraderie and shared spirit are often regarded as a significant moment for the Tongguang style. This article seeks to demonstrate, from Pierre Bourdieu's perspective, that Zhang Zhidong's staff formed a literary field embedded within a field of power. Driven by financial pressures, Shen Zengzhi joined this group, and his every action, including his poetic practices, was closely tied to the survival mindset of an outsider. His involvement not only influenced the history of poetry but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national history and even shaped the course of his later life.

**Key words:** Tongguang style, Shen Zengzhi, Chen Yan, Zhang Zhidong, the *Mufu* system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